

作者约翰·加弗 (John·W·Garver)，系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教授，是国际史学界中苏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本文是作者在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办的《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专题论文，原题为《蒋介石寻求苏联加入中日战争》。该文在充分占有外交档案史料及当事人回忆的基础上，对抗战初期蒋介石寻求苏联参战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情况，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解释与判断，对我们了解当时国际形势、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双方对日本的态度等颇有裨益。

抗战初期 蒋介石 寻求参战 苏联始末

〔美〕约翰·加弗著 ● 王静译

一、蒋介石的战略构想 及其苏联问题顾问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时,蒋介石并不认为,单靠中国的军队能打败日本人。其赢得战争的基本战略主要有以下三点:A、延长军事抵抗以阻击日本人;B、争取苏联和西方国家介入战争;C、制订一项可接受的方案暂时与日本妥协。这三个因素是决定中国最终取胜的根本。

1937~1938年间,英美两国都不可能认真考虑对日采取军事行动。也没有迹象表明蒋介石曾幻想他们那样做。美国恪守孤立主义,而英国在安抚日本还是追随美国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英美两国都被国内深重的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所以只能听任其在远东军事形势的恶化。当时,蒋介石对他们所抱的最大希望是:对日本采取严厉而有效的经济制裁。

与此同时,蒋期望苏联而不是英美的军队直接介入战争。蒋介石期望,当中国军队拖住日本人,而英、美、荷等国又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时,苏联会介入战争。许多因素使这种希望看起来似乎是可能的。苏联是日本向满洲渗透的宿敌。1931年9月日本占领满洲后,日、苏关系处于风雨飘摇中,两国随时都有打起来的可能。30年代中期,苏联的工业和军事实力有了长足进步,其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大大地加强了。英美在远东军事势力微弱,而苏联在满洲、朝鲜边界屯有强大的陆军和空军,且与日本只有一狭窄的水域相隔。蒋希望,一旦日本人陷入中国大陆的汪洋大海而实力受损后,苏联将出兵中国打击日本,这样,日本被迫两线作战,而中苏联合摧毁日本。

在抗战最初的18个月中,在外交方面,中苏两国的利益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国坚决支持莫斯科的呼吁,要求西方国家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同时,莫斯科在劝说西方国家对日实行制裁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蒋介石,他们都希望看见一个包括中华民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反战和平阵线”的出现。蒋认为,一旦“和平阵线”建立,这将为苏联欧洲部分边境的安全提供保证,从而允许,起码会宽容苏军在远东的行动。蒋深知,莫斯科最

担心两线作战,而和平阵线的出现,将会稳定欧洲局势。这样,苏联就有可能在远东采取强有力的政策。

1937~1938年,在对苏问题上,蒋介石有三个智囊,他们是:1936年10月至1937年11月任中国驻苏大使的蒋廷黻;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国防部副总参谋长、继蒋廷黻之后任驻苏大使的杨杰。这三个人个性和政治观点迥异,但都对抗战初期的中苏关系有重大影响。

在这三个人中,蒋廷黻对苏联介入中日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持悲观看法。在整个30年代,他始终坚持认为,莫斯科不会为了中国人的利益与日本人打仗。在他看来,中国人关于苏联将介入战争的错误看法是极为有害的——它鼓励中国去打仗,但战争将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他坚持认为,与其从事一场错误的战争,使中国的情况变得比以前更糟,不如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让步。其基本思想是,如果没有打赢的实实在在的希望,一个国家不应从事战争。在1935年,蒋介石是根据蒋廷黻的建议处理对苏关系。

杨杰、孙科也主张加强同苏联的关系,但在苏联是否介入战争问题上,他们与蒋廷黻持不同观点。

30年代中期,杨杰逐步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苏、日必战。1933~1934年,他到欧洲和苏联进行了一次军事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苏联合将最终战胜日本。由于他是副总参谋长,所以其观点很快为蒋介石所闻。1937年底,蒋派杨杰赴莫斯科,名义上是考察苏联的国防工业,实际上是游说斯大林,请其扩大对华军事援助。1938年5月12日,杨接替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直至1940年4月18日。1937~1938年,杨不断向蒋传递信息,说苏联很快会介入中国抗战。他还被授命,努力设法去挑起日、苏冲突。

孙科是蒋介石的第三位苏联问题专家。当时,他领导着国民党内的左翼集团。其目光所及,看到的是中苏友好与中国内政走向民主的联系,并积极支持中苏加强联系。他有一种天真的看法,即苏联将支持为正义而战的国家和,并认为,一旦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苏联将站在中国一边,介入战争去抗击日本。蒋廷黻

认为,孙的观点是致命的。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廷黻建议蒋介石,派孙率专门代表团访苏,让其考察苏联,掌握苏联不会介入战争的第一手材料。然而,蒋介石根据自己的判断拒绝了蒋廷黻的建议。直到1937年11月,蒋才派孙以秘密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赴苏,寻求苏联援助。孙科一行于1938年1月抵达莫斯科。1938年~1940年,孙逐步放弃了他关于苏联外交政策上的种种错误观念。但直至战争结束,孙仍坚持,苏联方向是中国走向进步的唯一选择。

二、中苏联盟的形成

1937年8月,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这构成了中苏在1937~1939年亲密合作的基础。其实,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的谈判,早在1932年中苏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就开始了。当时,中国外长罗文干非常支持这一条约。在1933年4月,他甚至向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

国民党中执会委员、蒋介石的积极追随者陈立夫,回忆了他1935年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就中日战争中苏联对华援助可能性进行了讨论。陈回忆说,1932年,罗文干建议订立中苏互助条约,但鲍未接受。鲍认为,这样的条约“太危险”。对此,陈解释说,这种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苏联在华影响的增加,而日本对此会作出迅速反应,但中国实力薄弱,在日、苏战争中,中国不会给苏联多少现实的援助。1936年2月,陈经德国率秘密代表团访苏时,他继续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会谈,莫斯科仍很谨慎。当然,协议虽未达成,但会谈已有所进展。

1936年底,当蒋介石一面和谈,一面备战时,他希望获得苏联潜在的支持。1936年10月,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时,其主要使命之一,就是中苏条约的谈判。在莫斯科的第一年里,蒋就中苏互助条约、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与苏联官员谈判。外长李维诺夫表示不愿签订互助条约,因为他担心,如果苏联介入远东冲突,将有损其国际形象,同时,西方国家会本能地怀疑苏联的意图而减少对中国的同情。在李维诺夫看来,只有在英美某种程度上支持中国抗战时,苏联方能支持中国;在支持中国问题上,苏联不能走在英美的前面,但也决不远落在他们的后

面。

不过,在拒绝互助条约的同时,李维诺夫表示,愿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为向中国贷款购买苏联军火提供政治基础。但他强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应在南京而不是莫斯科签字。蒋廷黻认为,这大大降低了条约的重要性。显然,蒋廷黻和李维诺夫都懂得,来自苏联的条约是限制苏联义务的象征。蒋廷黻禀报蒋介石说,要订立中苏互助条约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互助条约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他向蒋建议说,要争取包括其他列强在内的多国同盟,而不仅仅是中苏联盟。

显然,李维诺夫的谨慎态度被斯大林否定了,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一个月,苏联事实上曾建议中国政府订立互助条约。1937年6月5日,鲍格莫洛夫大使照会中国外长王宠惠说,既然中苏两国在远东都谋求类似的“环境”,那么,苏联希望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鲍说,中国没有侵犯野心,所以苏联把强大的中国看成是远东和平的保证;相反,弱小的中国会引发战争。据此,苏联建议,中国政府应倡议英、美、法、荷、日、苏等国召开会议,订立太平洋地区互助公约。中国政府一旦提议,苏联将积极响应,并疏通其他国家,劝其参加集会。如果不能签订互助条约,苏联政府准备与中国单独缔结互助条约——他已将条约草案呈交王宠惠。在鲍格莫洛夫看来,双方缔结条约前,召开一次国际安全会议是必要的,因为国际会议的成果可能使中苏互助条约失其必要性。王宠惠责问鲍,苏联政府为什么不自己倡议召开太平洋会议。鲍说,由苏联倡议可能会引起种种怀疑。

令人惊奇的是,王宠惠没有立即将这一重要建议向蒋介石汇报。直到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王才将这一消息告诉蒋介石。据当时中国外交部苏联司司长周希才说,王宠惠对苏联的建议持怀疑态度。王认为,如此国际会议,由中国单独倡议是不合适的,应与英、法、美共同倡议发起。根据周希才的说法,“七七”事变时,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正就此问题进行会谈。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抛弃了王宠惠的谨慎态度。7月8日,蒋召王宠惠、孙科上庐山。事变后能否制止事态的扩大,蒋没有把握,但他已感到有必要认真准备,以防事态的进一步扩

大。蒋认为,若事态扩大,这将是全面抗战的开始。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与苏联达成协议,争取其军事援助和中苏互助条约的签订。

根据周希才的说法,当王宠惠、孙科去上海重新与鲍格莫洛夫开始会谈时,鲍认为,此时讨论互助条约已经为时太晚了。鲍说,签约的目的,旨在阻止战争的爆发,而现在战争已经打起来了。如果在日本1931年入侵满洲时签订类似的条约,可能会遏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今已失去意义了。此外,若苏联现在与中国订立这样的条约,它很可能遭到日本人的袭击,但苏联不准备对日作战。鲍解释说,刺激日本人进攻是不明智的。但他又说,现在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是合适的。

除了接受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别无选择,因为这毕竟是除此之外的最佳选择。1937年8月1日,蒋批准这一协定。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由王宠惠、鲍格莫洛夫在南京正式签字。8月29日公布这一条约,并于8月31日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通过。然而,令人纳闷的是,直到1938年4月26日,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长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才将这一条约送交立法院批准,立交由行政院执行。这种延宕可能反映了对西方国家对此作出反应的深深怀疑。1938年5月16日,立法院批准了这一条约。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核心内容有二条:A、它为中华民国争取大规模的军事贷款和援助,提供了政治基础;B、它保证在冲突整个时期内,双方都不得与日本发展贸易关系。它规定,倘缔约国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在冲突全部时期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1938年5月16日批准这一条约时,条约的这项条款具有重大意义。

蒋介石也认为这一条款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对苏联可能进行的欺骗有某种遏制作用。但是,蒋介石仍忧心忡忡,在遏制苏联可能的欺骗问题上,条约如何才能最终起作用。8月1日蒋批准条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苏联可能用这一协定向日本施加压力,尔后与其签订类似的协定以确保其中立地位。在整个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头上始终笼罩着一种阴影,即担心苏、日“瓜分”中国。正如经验丰富的邵力子在公开分

析这一条约时所指出的,莫斯科中止对日贸易的承诺,是以中国不参加德、意、日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为条件的。

三、寻求反侵略战线

南京希望,中苏条约能成为包括英美和其他西方列强在内的太平洋体系互助公约的组成部分。卢沟桥事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中国官员希望西方列强对日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7月16日南京政府向英、美、法、比、荷、意、德、苏等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控诉日本入侵华北,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也违反了巴黎和会的精神及国际联盟的惯例。从7月21日至27日,蒋介石召见英、美、意、德、法驻华大使,请求他们支持中国的抗战。

南京吁请西方列强与中苏联盟合作的努力,集中表现在1937年11月3日至24日召开的布鲁塞尔九国会议上。苏联和美国出席了大会,但日本和德国没有参加。据当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会议代表之一钱泰说,会议开幕时,中国代表对此寄予极高的期望,尤其希望会议作出决议,给蒋介石以物质援助——军事装备、军火、贷款和租借物资,所有这一切将使苏联军队出现在满洲边界和英、法、美海军出现在太平洋成为可能。中国代表认为,西方列强起码会同意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

南京的官员对西方列强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并不抱乐观态度。布鲁塞尔会议前一个星期,外长王宠惠密电中国代表,指示对待会议的方针。王说,会议是解决中日冲突的唯一机会。但我们应对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采取温和态度,以免使其难堪。“指示”还流露出一种希望——要求会议本着1922年九国会议的精神解决中日争端。如果会议不可避免地失败的话,我们的目标是劝说列强对日实行制裁。此外,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应“积极寻找途经,鼓励英美支持苏联出兵抗击日本”。

南京关于苏联和西方共同对日行动的构想,与莫斯科自己的安全战略是吻合的,1937年9月13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广泛的互助公约间的某种联系。文章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远东的事件将影响西方,东、西方应共同维护和平。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赢得世界和平

与共同安全的新工具。10月20日《真理报》上的另一篇文章说的更为明确：考察了欧洲和远东形势的最近发展后，日本和德国是两个“企图改变现状的列强”，他们企图通过新的世界大战以实现其目的。文章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最担心的是，英、美联合起来维护中国的门户开放。

莫斯科也象南京一样，希望布鲁塞尔会议向反侵略阵线迈进一步。它派外长李维诺夫参加会议，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苏联对会议是何等重视。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李维诺夫坚决支持中国的呼吁，号召“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日实行制裁。李维诺夫在会议上说，缓和中日冲突的努力曾尝试过，但失败了，我们认为，应积极采取措施遏制日本，且苏联准备加入制裁日本的行列。

遗憾的是，美国所关心的是如何安抚日本，而不是联合苏联反对它。美国代表团团长戴维斯基提议，组织一个小型委员会，希望日本参加而将苏联排除在外，以便考虑通过一项方案。这一提议激起李维诺夫的极大义愤，他以苏联受歧视为由当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对重庆来说，这是外交上所遭受的严重打击。据钱泰说，苏联退出会议后，会议再也没有讨论支持中国的“积极步骤”。中国外交官蒋廷黻对英美两国把苏联排除出远东问题之外的“不懈努力”深感疑惑。蒋廷黻渐渐认识到，在国联或布鲁塞尔会议上，苏联的“任何”举动，都是华盛顿和伦敦所极不愿看见的——蒋廷黻认为，这种态度是鼠目寸光。

最后布鲁塞尔会议通过一项方案，鼓励中日两国通过其他国家的帮助尽快结束冲突。中国对会议的结果大失所望。寻求西方支持的失败，使中华民国更多地依赖苏联。

布鲁塞尔九国会议期间，莫斯科不断暗示南京政府，它将介入中日战争。据蒋介石说，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斯大林曾破例接见中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参事张冲，表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卓有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

四、寻求苏联参战

许多中国人希望，1937年条约以及英美对这个条约表示支持的姿态能为苏联参战的行动

提供一个基础。这种想法很普遍，对此，蒋廷黻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不少记述。蒋回忆说：“当我出使苏联的消息公布后，各方都寄予厚望。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予我一连串的招待。每次聚会中，大家都希望我，要求我能设法使苏军与我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他们相信我一定能进行此一重要工作，他们希望，不仅进行，而且一定要完成这一工作。”另一些人虽希望如此，但心怀疑虑。这种复杂的感情反映了一般公众的想法。

蒋廷黻相信，莫斯科利用了中国人期望它介入中日战争这一点，推动中国去与日本人发生正面冲突，并在战争打起来之后使中国能坚持下去。1937年6月，莫斯科提出一份安全互助条约草案，可能就是为了鼓动中国加剧同日本的紧张关系而做出的一种努力。据蒋廷黻回忆，鲍格莫洛夫不断使用巧妙的手法在中国煽起战争狂热。特别是在他私下会见一些中国人，通常是政治领袖和记者时，他总是暗示，如果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准备给予中国一切必要的援助。蒋廷黻说，鲍格莫洛夫对政府官员说话还是比较谨慎的。但至少有一次他告诉蒋廷黻本人，苏联愿意订立安全互助条约，并在中日战争中给予中国实际的军事援助。鲍格莫洛夫的行为超出了苏联政府授给他的权力。蒋廷黻猜想，鲍格莫洛夫认为日苏交战会使斯大林垮台。

在战争最初的18个月中，蒋介石试图说服斯大林命令苏联红军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则小心谨慎地拒绝了这些请求，他担心直接了当地拒绝会使蒋介石转而与日本人媾和。

从其顾问那里，蒋介石不断收到关于苏联参战可能性的截然相反的情报。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1937年冬是我最感困难的一个冬天，因为杨杰将军呈给委员长的电文中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而我的电文却表示非常失望。”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蒋廷黻呈交给蒋介石一份极为悲观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非常肯定地说，苏联不会参战，除非它自身遭到日本人的袭击。当外长王宠惠在国防最高会议秘密会议中宣读其报告时，孙科断言，蒋廷黻在莫斯科的使命“失败”了，因为他“误解”了苏联的意图。蒋后来回忆说，“据此，也许还有其他理由，我被调回了”。

1937年底，杨杰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会谈，据此，杨认为苏联红军即将参加对

日作战。11月12日,杨杰给蒋介石拍了两封电报,谈了苏联参战的可能性。在第一封电报中,杨援引斯大林的话说,苏联参战只会使日本民众紧密地团结在政府周围,从而导致日本反战运动的失败。斯大林总结说:“因此,苏联对日本开战要等待时机之到来。”杨杰的第二封电报总结了他近期与伏罗希洛夫的会谈情况。杨说,伏罗希洛夫同意蒋介石的意见,即苏联参战将为远东的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但伏罗希洛夫又说,苏联有许多疑虑。因为,如果苏联卷入远东战争,西方“将接踵而至”,而在两线作战中苏联没有成功的把握,因此,苏联目前必须继续为此准备。但杨杰又电告蒋称,伏罗希洛夫曾说,这些准备“其时期固难定,但……准备已快了”。这又是一次巧妙的暗示,再次鼓舞中国继续抗战的勇气。

12月6日,杨杰又电告蒋介石他与伏罗希洛夫进一步探讨苏联“出兵”问题的情况。杨报告说,斯大林担心苏联参战会使全世界都与之作对,因此,苏联只能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斯大林了解中国抗战的艰难困苦,但他深信:“最后胜利在华,务望坚决抗战到底。”在电报的最后,杨杰评论说:“已默察苏联于参战问题顾虑虽多,亦非绝对不可能者。”杨杰建议,中国政府应努力敦促英、美、法三国向苏联提供“相当之保证”,造成环境演变,使苏联自动出兵。

同年底,苏联红军远东军司令、20年代初曾以加伦的化名在中国供职的布柳赫尔元帅发表了一次演说。在演说中,他也努力使中国相信苏联将出兵参战。据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说,布柳赫尔声称,如果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必要的,苏联红军将毫不犹豫地跨过国境作战。董显光认为,布柳赫尔的演说旨在阻止日本扩大侵华规模,从而遏止日本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据蒋廷黻说,杨杰将军在与伏罗希洛夫会谈时,曾得到过一个印象:一旦日本占领了南京,苏联将会参战。杨杰把这个“情报”电告给蒋介石。虽然杨杰并未把这封电报送给蒋廷黻本人过目,但他闻讯后,不仅为“杨的想象力之丰富所震惊”,而且立即另给蒋介石拍了份电报,告诉他不要相信杨杰的话。可是12月中旬南京沦陷后,蒋介石还是致电斯大林,援引杨杰与伏罗希洛夫的会谈作根据,要求苏联出兵。

同在12月份,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直接打

电报给蒋介石,解释其在参战问题上的种种困难。电报说,如果苏联出兵中国,且不说日本对此会作出直接反应,就是“整个世界也会说,苏联是侵略者,这样对日本的同情将在世界各地迅速滋长”,而这无论对中国还是苏联都是不利的。斯大林认为,只有当九国公约国家,至少是其中主要国家同意在对日问题上与其合作时,苏联才能立即出兵,“只有在那个时候,世界舆论才会认为苏联行动是保护法律及正义之当然的行动”。斯大林说,苏联不受日方直接挑衅便不出兵的政策,只有最高苏维埃会议才能改变,而该会议在一个半月内不会召开。在此期间,苏联将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华援助。在其尚未对苏联参战问题封口时,斯大林再一次说:“不是现在!”

当李维诺夫向蒋廷黻转达斯大林的否定答复时,完全否认杨杰提到的苏联官员曾作过类似许诺。蒋廷黻建议,既然是斯大林通过杨杰收到蒋介石的电报,那么他应通过同样的渠道予以答复。李维诺夫拒绝了,他坚持要蒋廷黻传递斯大林的信息。李维诺夫还说,“其他渠道”是不可靠的。

另据蒋廷黻回忆,杨杰曾想设计逼迫苏联出兵。1937年中,当蒋廷黻随同孔祥熙等中国官员将要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时,杨杰怂恿他在伦敦向路透社记者宣布,苏联将在两周内参加对日作战。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可是杨杰认为,日本一旦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这样可把苏联拖入战争。^[1]蒋廷黻拒绝了杨杰的建议。

12月13日南京陷落了,随之而来的是日军对南京居民残酷的大屠杀。由于南京陷落后苏联并未出兵干预,杨杰于1938年1月5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汇报自己的工作。在信中他列举了苏联不能立即参战的三个原因:A、英美舆论在中日战争中同情中国,但在日俄战争中将持观望态度(在此,斯大林通过杨杰再次间接表明了他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即这场战争是吸引美国和英国加入他所倡议的反侵略阵线的一个途径)。B、苏联希望建立包括美、英、法在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在此之前,苏联必须竭力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C、斯大林怀疑英国的意图。他认为,英国不愿意中国战胜日本,并希望日苏之间也爆发战争。英国则在战争中帮助较弱的一方。随后,杨杰在信中进一步阐明了

他关于如何诱使苏联出兵的意见，暗示要使用他曾向蒋廷黻建议过的那种计谋：

职曾提出意见，苏联认为对日作战，既有种种顾虑，可否另有一种有效方法刺激日本或联合有利害相同之国家，出面干涉以利中国之抗战……总之，欲使苏联参战，职见必须造成使苏联不能不参战之环境。其制造之法，第一，想法使英美为其后援，或使其有西欧安全之保障。第二，中苏关系益密，日方感觉不利，对苏联挑衅，则苏联不能忍受，彼必起而与之周旋矣。

1937年11月，为了寻求苏联扩大对华援助，蒋介石派孙科赴莫斯科。1938年初，孙科抵达莫斯科。2月4日，孙科与斯大林初次会晤。两人边饮酒边会谈，直至深夜。在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在赢得苏联出兵的过程中，中国要有耐心。2月7日，孙科将会谈内容禀报蒋介石：斯大林说，目前的国际局势尚不宜于苏联出兵干涉，还需要等待时机成熟。如果美、英、法改变态度，愿意与苏联一道采取行动，那么苏联就可以出兵中国了。斯大林接着说，若苏联单独出兵，那不仅会促使德意去援助日本，甚至会助长那种认为苏联打算赤化中国的误解。所有这些都违中国抗战的利益。因此，苏联政府决定，继续奉行现在的不直接介入的政策。苏联将继续向中国提供物质援助并鼓励美、英、法支持中国。最后，为不致使中国人对苏联参战的彻底绝望。斯大林说，苏联的远东部队同时“亦在积极演习中，待机可动”。

1938年3月，日本人准备从山东南部向苏北的徐州发动进攻，蒋介石再次要求苏联出兵。徐州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为夺取徐州，日军需要抽调其先前部署在满洲的部队，这就削弱了日本人对抗苏军的能力。发动徐州战役，是日本在华野战部队的将官们旨在破坏东京参谋本部想要阻止继续扩大对华战争而采取的一项行动。总的说来，蒋介石相当了解日本内部的矛盾冲突。他或许知道徐州战役迫在眉睫并懂得它的幕后涵义。日本情报科科长王芃生早就告知蒋，日本人在对华政策上有分歧。1938年2月，蒋介石曾派外交部日本科科长董

道宁去日本与日本官员秘密会谈。董道宁在日本逗留了两个星期，会见了一些反战派的领导人，并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带回了他们的日本老朋友的信件。董道宁的日本之行导致了其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日本领事在香港的秘密会谈。这次谈判从1938年4月16日开始一直接续到5月份。当中、日、苏关系错综复杂而日本内部又存在着激烈的派别冲突的情况下，不要说苏联参战，哪怕仅仅是军事演习或集结兵力作出即将参战的姿态，都足以大大加强日本国内反苏分子的论据。这些人主张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充分准备，伺机进攻西伯利亚。1938年初，蒋介石与日本人的谈判，一方面是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另一方面，争取苏联更多的支持又是为了加强东京主和派的势力。

1938年3月10日，蒋介石致电在莫斯科的杨杰，命令他求见伏罗希洛夫，敦促苏联进攻满洲。蒋介石说，日本已向中国内地抽调了8至12个师团，北满空虚，若苏联此时出兵将效果显著。蒋还提及2月4日斯大林在与孙科会谈时曾讲过的苏军调动问题，并据此指示杨杰，即使苏军不能直接参战，也应敦促伏罗希洛夫在满洲及朝鲜边境集结兵力，以牵制日本调更多的部队到南方去与中国军队作战。蒋介石强调说，即使是这样的行动，也“大有裨益”。

5月21日，徐州陷落，武汉保卫战开始。武汉是尚未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最后一个中国主要的工业城市。它处在长江的东西轴线上，是富饶的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中心，并且是中国南北铁路的衔接点。武汉再陷落，将是对中国抗战的严重打击。武汉保卫战标志着已经持续了15个月的中日战争到了决定性阶段。日本战线拉长且兵力不足而疲惫不堪。相反，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极为高涨，国共两党的团结也空前加强。若能遏止住日本人的进攻势头，那应该是在武汉；如果苏联打算出兵的话，那么武汉保卫战正是其参战的最佳时机。

武汉保卫战打响后，汉口《大公报》出版过一本书，分析了苏联参战的前景，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为代表的中国人，对1938年中的中苏关系持乐观态度，这反映了中国人在那关键时刻的思想。褚玉坤在《动荡中的中苏关系》一书中声称，苏联的实力不足以同时在欧洲和远东对付两个强大的敌人，但是，如果美国愿意与苏

联合国而对日持强硬政策的话，苏联就会出兵中国援助抗战。英国迟早会采取强硬政策，在这种形势下，苏日开战势在必然。最后书中写道：“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战斗，国际形势总有一天会改变的，苏联出兵远东的这天终将来临。”

6月，当日军向武汉进军时，蒋介石继续敦促苏联参战。当时，德国上层人物内部的激烈争论刚刚结束，外长里宾特洛夫的亲日派观点占了上风。希特勒也同意与日本结盟，而放弃中日战争中的中立立场。这一重大转变的直接影响是，德国召回了它在中国军队中服役的军事顾问，其中包括深得蒋介石信任的精明干练的高级顾问法根豪森将军。6月2日，蒋介石致电继蒋廷黻之后出任大使的杨杰，指示他请求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派一名得力的象加伦那样的人，到武汉担任蒋的总顾问。加伦将军是特别远东军司令。如果他接替法根豪森被任命为总顾问，那将是苏联支持中国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而日本人会视此为带有挑衅性的行为。6月2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杨杰，寻问苏联召回其大使是否意味着对华政策有所改变。蒋说，最近德国已经改变了政策，根据他个人的判断：“倭德对俄不久必有特殊举动。”事实上，蒋是在暗示斯大林，中国完全站在苏联一边而不是轴心国一边，目前苏联的敌人已经互相靠拢。因此，在德国发动进攻之前，中苏联手迅速击败日本，是斯大林的唯一明智之举。

1938年7月和8月，苏朝边界的哈桑湖西侧张鼓峰附近发生了大规模冲突。这是苏日第一次边界冲突，双方动用了陆军师、装甲部队和空军。这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对苏联参战所素持的幻想。这种气氛在1938年7月中旬武汉晚宴上弥漫到了顶点。据当时刚离任回国担任政务处处长的蒋廷黻回忆说，出席宴会的大多数人认为，张鼓峰事件是苏日开战的信号。有人甚至走得更远，认为日本财政将于9月份崩溃。蒋廷黻本人则争辩说，苏联是不会参战的，张鼓峰事件只是一次边界冲突，缘起于双方的边境指挥官的擅自决定，而非执行两国政府命令的结果。蒋廷黻认为，就加伦本人来讲，他的行动不仅未受上级指令，而且可能是违反政府方针的。在蒋廷黻看来，宴会上许多人的乐观主义发言，无非是为了迎合讨好蒋介石。不过，

蒋介石在晚宴行将结束时说：“廷黻说的对，散会吧。我们要自己努力，就当张鼓峰事件没有发生。”由此蒋廷黻得出结论说：“如果说蒋介石对苏联直接军事援助曾经存有任何幻想的话，他一定是放弃这种幻想而面对残酷现实的第一人。”

其实，蒋介石可能不象蒋廷黻所说的那样，充满了幻灭感，蒋本人只是意识到苏联参战的可能性虽然正在减少，但即使他本人希望获得外国的干预，也不宜于在这种场合流露出来，对此期望过高，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所以对蒋介石来说，最好还是轻蔑这种思想——起码在宴会的那种气氛中他应该那样做。例如，在1938年1月底，他曾提醒其幕僚们，战争初期中国所犯的错误的中，最大的是认为列强会共同制裁日本，而中国可以进行防御战。不管蒋介石本人在1938年中对苏联出兵参战抱有多么强烈的幻想，他也不愿在其下属中不适当地助长这种情绪。

7月27日，蒋介石致电杨杰，询问苏联对张鼓峰事件的态度。为了劝说苏联官员，蒋介石授意杨杰：日本很可能建议成立一个边境问题委员会来冲淡日苏间的紧张气氛，以赢得时间，从容地调动部队对付苏联。日本的意图如此明显，苏联政府不应被日本人所迷惑。蒋令杨探寻苏联对日本的态度坚决到何种程度；苏联大使调回国后将于何时返回中国；杨杰是否见过苏驻华大使。蒋令杨迅速答复。8月2日的电报，蒋又重申了这些问题，并要求杨证实下列报道：在张鼓峰冲突中，苏军伤亡200人，损失飞机5架。

8月10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与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在莫斯科达成协议，张鼓峰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的希望再次落空。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当他获悉张鼓峰事件和平解决时，他是多么的痛苦。蒋介石写道，如果日本建议与中国合作反共产主义是出于真诚的话，它就不该在张鼓峰冲突失利后如此屈辱与温顺了。

8月7日，在李维诺夫和重光葵协议公布前不久，孙科从巴黎拍给蒋介石一封长电，概述了苏联在参战问题上踌躇不前的理由。孙科说：苏联政府担心，一旦苏联参战，中国有可能与日本人单独媾和。苏联政府还担心，德、意会利用

其在远东作战的机会，趁机从西部发动进攻。但欧洲的形势已有所改善，孙科说，英美正加强合作，牵制德意。因此远东形势的变化不会引起欧洲局势的大动荡。所以，中国应对苏联充满信心，精诚合作，不仅局限在战时，且应持续到战后。为了寻求与苏联的持久联盟，中国应采取与之相同的政治、军事、外交行动。孙科甚至提出，莫斯科担心中国战后会变成法西斯国家。为了消除这种疑虑，中国应推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发展工业，并停止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的歧视。孙科评论的第一部分——关于中日和谈的危害，欧洲局势的变化以及中苏进一步团结——可能忠实地反映了东道国苏联的看法。这种观点的结果是把苏联未能参战的责任转嫁到中国人头上，并使中国对苏联参战仍抱有幻想。孙科关于中国国内形势的评论是他本人的思想，还是苏联官员向他陈述的观点，目前尚不清楚。

9月下旬，日军分三路围攻武汉，武汉保卫战进入最后阶段。蒋介石在1938年为寻求苏联参战作了最后一次努力。9月30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使，敦促苏联采取军事行动遏制日本。两天后，蒋又致电杨杰，通知其与苏大使会谈的情况。蒋令杨向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探询，他们是否做好了在日本采取“军事制裁”的准备。蒋建议，以苏法、苏捷条约的方式订立中苏互助条约。鉴于当时四国列强慕尼黑协议的形势，蒋令杨转告斯大林：

我方认为，此时苏联应对远东之侵略者作最有效之制裁，而对我国作进一步之接近……目前欧局既可暂望安定，不必有西顾之忧，趁此时机亟宜予远东侵略者之日本以教训，使他日德国亦无能为力。并告以中国人民一般心理均认为苏联向以帮助被压迫国家为国策，实为中国最真实的患难之友。现在我抗战已将15个月，抵御侵略已达最艰苦之严重关头，中国本身力量已完全发动使用殆尽，苏联必不愿中国功败垂成，使远东侵略之狂焰高涨，世界祸患更难收拾。

蒋介石指示杨杰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全

面而诚挚地阐述这些理由，并设法疏通苏联外交官员，尽最大的努力去鼓励苏联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蒋还嘱托杨杰及时复电。10月9日蒋介石再次召见苏联大使。

当然，在1938年苏联并未参加中日战争。10月19日，蒋介石下令撤离武汉，10月21日，武汉沦陷。

一旦认识到苏联不会参战，蒋介石的政策便开始转变了。武汉失守后，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虽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但规模却大大地缩小了。在口头上，双方仍高喊着友谊与共同利益的口号，但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最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把眼光洒向别处，开始寻找新的可靠的外国伙伴——斯大林与柏林“调情”；蒋介石则向华盛顿“暗送秋波”。这种趋向分流最终导致了抗战初期18个月中形成的中苏联盟土崩瓦解。

五、蒋介石与斯大林的得与失

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一年半的时间中，蒋介石与斯大林对于对方国家的战略各有得与失。蒋介石未能诱使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但他的确获得了苏联巨大的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援助。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支持中国是同一时期支持西班牙的补充。斯大林想把这两个地区的冲突，当成苏联自身与西方国家合作抗德的助产婆。在这点上，斯大林的战略失败了。但苏联在中国与西班牙的另一个意图是牵制、束缚、消耗日本和德国的力量。在这点上，斯大林的战略是成功的，至少在中国是如此。蒋介石领悟到自己在苏联实现其目标时所扮演的角色，并为此而深感凄苦；而斯大林也为中国的服务付出了所能容忍的最大牺牲。

当苏联开始从中国脱身与德国结盟时，美国又开始把中国作为它对付日本人的工具而逐渐增加了对华援助。在学者们的眼中，罗斯福与斯大林并没有多大差异，都是出钱给中国，让中国丘八缠住日本。在后来与美国人的来往中，蒋介石无疑受到了他在抗战初期与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的影响。蒋介石决非担心列强玩弄后来被政治分析家们所称之为“中国牌”的最后一位中国领导人。

（责任编辑 杨小波）